

JLW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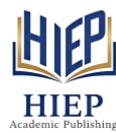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JLWE, Vol. 1, No. 2, 2025, pp.305-314.

Print ISSN: 3078-8129; Online ISSN: 3104-507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w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2.12](https://doi.org/10.64058/JLWE.25.2.12)



精灵叙事与 19 世纪欧洲的人工智能想象——安徒生作品另解

傅 薇 (Fu Wei), 王紫怡 (Wang Ziyi)

摘要：精灵叙事是安徒生童话中不可或缺的。19世纪的欧洲，科技的迅猛发展与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激发了人们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此时，人工智能的概念虽然尚未出现，但人类对于智能的渴望与想象却已经开始萌发。这些想象的具象化常常由文学作品中被描绘成具有超自然能力的“精灵”来承载。丹麦著名作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写作中体现了当时欧洲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状况，他与科学家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也使得童话作品中的精灵叙事脱离了传统神话的藩篱展现出现代性风貌。精灵不仅能够协助人类获取知识信息、完成既定工作，还能够与人类展开无差别的沟通与交流，并与人类产生情感的联系，与今天我们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重新阅读他的作品，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深入理解 19 世纪欧洲人工智能想象的窗口。

关键词：安徒生；精灵；叙事；人工智能；想象

作者简介：傅 薇，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电邮：113716023@qq.com。王紫怡（通讯作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电邮：ZYLuminosity@163.com。

Title: Elves and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of AI in 19th Century——A New Interpretation of H.C. Andersen's Works

Abstract: Elves-narrative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Hans Christian Andersen's literary works.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urope stimulated people to explore the unknown world. At that time,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s not yet appeared, human desire and imagination for intelligence have begun to sprout.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se imaginations is often carried by the “elves” depicted as having supernatural abilities in literary works.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 famous Danish writer, reflected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society at that time in his writing. The friendship between him and scientists also made the fairy tale narratives break away from the barriers of traditional myths and showed a modern style. Elves can help humans not only acquir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complete the established work, carry out indistinguishable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with humans, but also have emotional contact with humans, which is similar to discussions on AI today. It not only provides us with a unique perspective to re-read his works but also opens a window for u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of AI in the 19th century.

Key words: H.C. Andersen; Elves-nar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magination

Author Biography: **Fu Wei**,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Master’s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Area: Marxist Ideology. E-mail: 113716023@qq.com. **Wang Ziyi** (Corresponding Author), Master’s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Area: Western Marxism. E-mail: ZYLuminosity@163.com.

引言

丹麦作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05-1875)，是 19 世纪丹麦著名的作家，其所写的童话内容极其丰富，包含的哲理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2025 年是安徒生诞生 220 周年（同时也是逝世 150 周年），重温安徒生童话中的经典故事，不仅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一百多年前的人们如何在急剧变革的社会进程中安放自己的心灵，同时也看到了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的预见。

通读安徒生童话作品，可以发现其中不乏科学想象(柏灵, 2018, pp.97-107)。这些科学想象不仅体现了安徒生所处时代对于物理、化学等科学领域发展的认知，而且结合今天的发展，我们甚至可以找寻到当时的人们对于未来可能实现的人工智能的预判与想象。尽管智能化是 20 世纪才纳入人类议题的事情，“仿人工智能”就已经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萌发于欧洲（程林, 2023, pp.8-17）。所以，经过 19 世纪人类社会工业高度发展，人工智能想象体现于人类书写，可以说是一个必然图景。20 世纪初，机器人就已经以清晰的形象踏入文学想象的“实验场”（江晖, 2023, pp.114-125）。“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简称 AI）概念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才诞生，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想象必然在更早的历史阶段就已经存在了。进入现代社会，人们通过艺术创作来刻画出人工智能现有的发展水平或其将要达到的发展程度。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想象在文学作品中化身为无所不在的精灵，洞察着人类生活的一切，无所不能。它们能够跨越种族的隔阂、语言的障碍，与人类自由交流并运用着其独有的智力、情感和道德准则。

安徒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以“童话”^①的方式，在通过对社会发展的综合研判基础上，表达了他对于社会发展，尤其是智能化发展的未来前途的关怀。正是因为他能够通过一种巧妙的方式来进行书写，饱含了对于祖国的热爱、对于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怀，体现了人类共同价值。所以，从19世纪开始，安徒生的作品就被收录到丹麦学龄儿童练习阅读技巧的教材中，比如《儿童用心阅读的诗歌和韵律》(Digte og Riim for Børn til Udenadslæsning, 1840年)、《儿童学校用诗》(Digde for Børn til Skolebrug, 1859年)，等等(Arne Klara Bom & Caroline Schaffalitzky de Muckadell, 2021)。即便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当传统的经典被搁置起来，自由选择的做法风靡教育界时，他的作品仍然被教师们选择，并出现在丹麦的学校课程当中。在众多译本中，尤以最贴近丹麦语的索汉斯卡(Sochańska)的译本为首，展现了更为“真实的安徒生”，彻底颠覆了我们熟悉的传统童话形象。(Dymel-Trzebiatowska, 2015, pp.196)研究他的经典作品为我们当代人思考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作出既属于本土又属于全人类的文化财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安徒生作品中的“精灵”书写

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来苛求一百多年前童话作家对于科学想象的书写。作为一个在艺术和科学之间穿行的作家，尤其是当世人常常以“童话”来对其作品进行类型学分析时，对于科学的想象和书写似乎要经由一个合适的载体来完成，而这个载体就是“精灵”。

在文学理论家——法国的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看来，具有奇幻色彩的文学作品就是关于社会现实的。因为，当只知道自然法则的人在面对无法以现有知识框架来合理解释的现象时，充满幻想的书写是一种协调的方式。而在黑格尔左派观点的指引下，勃兰兑斯(Brandes)则直接指出，文学是一种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中介物，一方面是要批评当时的宗教，另一方面是要对更加广泛的社会受众传达一种现代性(Dirk Johannsen, 2016)。所以，当时文学作品也为此增加了助推这种风潮的动力——以新的叙事风格和叙事策略来干扰在社会中存在已久的、既定的意识形态。

很显然，在19世纪的丹麦甚至是整个欧洲，宗教是社会中传统的、既定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传统宗教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显得无能为力之时，对于社会中新发展力量的书写必然会有存在于文学作品中。安徒生在1838年创作的戏剧《黑白混血儿》，一开始被评论家认为是“琐碎、单调，没有任何真正戏剧性的趣味”，如此等等(贝恩, 2019, p.183)。但这部不被看好的剧本却在1840年公演后获得了非凡的成功。除了著名演员的出色表演外，其关键原因就是“剧中人物超越了种族和肤色的界限，与当时的自由主义思想不谋而合”(贝恩, 2019, p.187)。

细读以“童话”命名的安徒生作品，能够从其早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书写中发现当时的人们对于社会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的感受和需求。众所周知的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认为，人类有多个层次的、呈金字塔型排列的需要。而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处于人类诸多种类需求的底端。这些处于底端的需求力量更大、能动性更强。发表于1835年的《打火匣》讲述的是一个退伍士兵在回乡路上偶然获得一只神奇的打火匣，由此轻易获得了不少钱财，解决了最为基础的生活需求，比如衣食住行问题。打火匣为退伍士兵开启了财富自由之路，士兵却进一步希望依托打火匣的魔力实现阶层跨越——娶公主。这就触怒了国王，引来了杀身之祸。在刑场上，又

^① 安徒生的“童话”，事实上应该是“民间故事”。参见：[英]罗伯特·尼斯特·贝恩.2019.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一部传记[M].北京：华文出版社：142.

是打火匣挽救了士兵的性命，不仅保障了他人身安全，甚至还趁着法场兵荒马乱之时，顺势推翻了国王及其统治（安徒生，2014, p.33）。

如果说《打火匣》只是一个体现了东方故事“阿拉丁的神灯”内容梗概的欧洲化翻版，那么后来的《玫瑰花精》^②则具有明显的欧洲特色。这个故事是对《十日谈》中相关情节的再创造。正是在如何实现“恶有恶报”这个问题上，作者使用了一种隐喻来表达用现代化手段为社会生活带来安全的愿望。《玫瑰花精》讲述了一个原本藏匿于玫瑰花中的小精灵，因为没有来得及逃离被摘掉的花而跟随一对恋人到了大树下。它被恋人之间分别时的依依不舍所感动，也亲眼目睹了女方的哥哥因为嫌贫爱富而在他们分别以后用恶毒的方式谋杀了妹妹的男友。随后，玫瑰花精偷偷地把这起案件原原本本告知了女子，并邀约蜜蜂们对罪犯进行惩罚。

这个故事相对于《十日谈》而言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大幅度的前进。《十日谈》中的众多故事是以十四世纪欧洲大瘟疫为历史背景的。此时的欧洲正处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的开端。尽管在科技方面较之过去有些进步，仍然还处在较为落后的阶段。所以，以当时的社会条件，要对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杀人越货的恶人进行惩治，《十日谈》中故事的作者仅仅只能用托梦的方式将犯罪者的罪行昭然于世。安徒生的书写显然反映了19世纪欧洲的科学发展趋势。请看这个精灵叙事的最后一段——“蜂后在空中嗡嗡地吟唱。她唱着花儿的复仇和玫瑰花精的复仇，同时说道，在最细嫩的花瓣后面住着一个人——一个能揭发罪恶和惩罚罪恶的人”（安徒生，2014, p.305）。摄影师达盖尔的银版摄影法于1839年在法国诞生。而在此之前，19世纪20年代的欧洲已经出现了可以永久保存的照片。这为人类精准地记录社会轨迹提供了可能。虽然使用监控来维护社会安全已经是一百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但故事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安全的欲求始终未变，并预示了科技的发展在社会安全领域可以达到的一种可能。

二、“精灵”书写作一种稳妥的叙事策略

在丹麦，“信什么”的问题本就具有其历史复杂性。身处在这个社会变革期的安徒生必须要不断地调试自身的思维准星——既不要与自己或者当时大多数欧洲读者与生俱来的认知模式发生彻底的决裂，又要在已经成为必然趋势的科技现代化浪潮中保持自己作品与时俱进的风格。而且，从安徒生的个人成长轨迹来看，精灵书写对于安徒生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

首先，在安徒生的童话作品中，屡屡出现的“精灵”是继承了北欧神话叙事的传统。

北欧神话所强调的是多神论。在这个叙事系统中，精灵是必不可少的主角之一，它们为诸神服务，经历着新旧世界的交替（宋晓梅，2007, pp.91-93）。安徒生的祖国丹麦作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一，在欧洲历史中曾长期处于边缘的地位。这当然与其自然地理条件具有密切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丹麦是基督教较晚传入的国家。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就是其文化和意识形态所受到的基督教的影响远逊于在那些在欧洲长期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上帝慢慢地退居后台，而让位于公正、人民等世俗概念，上帝也不再是政府活动的重要目的。上帝渐渐降到助手级别。这个变化正中当时自然神论者下怀”（耶斯佩森，2024, p.111）。而且，北欧神话中的多神传统并未随着“上帝”这一神的到来而退场，反而形成了同时在场的局面，“众神各自负责人类生存的某个重要领域。他们呈现

^② 1838年圣诞节到1842年圣诞节期间，安徒生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童话故事集，其中包括《玫瑰花精》。所以《玫瑰花精》的发表是在1838至1842年间，晚于《打火匣》。参见：[英]罗伯特·尼斯特·贝恩.2019.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一部传记[M].北京：华文出版社.

为人形，很大程度上拥有凡人的行为方式。他们生活在稳定构建的社会共同体中，就像当时的富农一样”，（罗斯达尔，2022, p.203）这也造就了文化上的独特性。上帝与本土文化中的多神造成的张力在与安徒生同时代的哲学家克尔凯郭尔那里表露无遗，“他仍经常会害怕，害怕由于没有及时地让这思想变成基督教的，因而精灵和山怪们就得到权力去在这位置上留下一个替代儿”（克尔凯郭尔，2023, p.iv）。这也就是说，基督教在国家的文化生活中理所当然地应该占据一个主导地位。如若在其作品中不能反映这种特质，则作品的主人就应由此受到责难。所以，安徒生在书写中对于“上帝”的态度出现了动摇，也就成为了他批评的对象。

其次，安徒生的家庭背景为其精灵书写提供了在“唯物”与“唯心”之间反复徘徊的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

安徒生于 1805 年出生于丹麦欧登塞的一个社会底层的家庭。安徒生的父亲是一个贫穷的鞋匠，具有一点无神论的思想。而母亲则是一个质朴的劳动妇女、虔诚的教徒。在安徒生的自传里他清楚地回忆道，在幼年时期，当出现了彗星，其他人只能在《古代女先知的预言》^③和基督教中寻求对未来的判断时，他的父亲却能够在迷信之外给出较为正确合理的解释，“我这才领悟到父亲的信仰和我们是不同的”（安徒生，2020, pp.5-6）。家庭的影响和之后的社会经历使得他初步地具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萌芽。这在他的文章《园丁和主人》中已经体现出来。

发表于 1872 年的《园丁和主人》中讲述了一个迂腐傲慢的封建贵族和勤劳的园丁之间的故事。园丁拉尔森的主人——一位富有的贵族拥有着一处古老的庄园。拉尔森在庄园里辛勤劳动培育了美味的水果和独特的鲜花，这些优质的农产品走出了庄园而在上流社会闻名，傲慢的主人竟然豪不知情还到处打听其出处。当无知的主人得知这些东西出自自己的园子时，不仅没有向园丁表达敬意，反而更加傲慢了。但园丁不以为意，继续在园艺领域深耕，并最终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安徒生，2014,p.1443）。

在这里，安徒生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一个意思，那就是人民群众是财富的生产者、是历史的创造者。安徒生的很多创作灵感来源于他对于生活的体验，有些甚至就是他本人生活的写照。母亲作为虔诚教徒对于他的影响不可磨灭，但现实的生活已经使他深刻地感受到尽管是劳动人民在改造世界，但对于“上帝”的笃信却不能够顺理成章地改造底层劳动人民自己的生活境遇。所以，那些人们所期待的超能力，越来越不属于“上帝”了，它必须有另外的“代言人”。于是，精灵叙事填补了在“上帝”逐步退场的过程所造成的空缺，而使人们对于未来的向往能够有所依托。

第三，丹麦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科技进步的力量。

1848 年，国王弗里德里克七世宣布以君主立宪制代替封建的君主专制，并于翌年批准了民主宪法（耶斯佩森，2024,p.66-68）。之后，资本主义在丹麦国内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 19 世纪的欧洲，丹麦的境况显然不能与工业革命的故乡——英国相媲美了，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发展势头也远远不如在美洲大陆上建立起来的新兴国家——美国。基于此，立足本国既有的优势，发展农业是一条务实的选择。与拥有许多势力强大的大地主的国家（比如邻近的普鲁士）不同的是，丹麦的农业生产主要由独立农民承担。这就比较容易通过组建新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来实现对粮食生产的升级和转型。而农产品的商品化则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为工业化提供了基础（朱天麟，

^③ 即《女占卜者的预言》，来自中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北欧文学经典《埃达》，描述了世界的创造和毁灭以及诸神和精灵等。

2008, p.78-88)。很显然，工业化与科技发展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大规模的生产和市场，不仅推动了科技的研发和应用，也不断催生着各种新兴科技的研究和发展。1849年，安徒生的挚友、也是首先发现电流磁场的丹麦物理学家、化学家奥斯特的《自然精神》问世，深深触动了安徒生。尽管安徒生在后世的传记作者像他的朋友们一样认为在1849年至1851年之间，安徒生在文学创作上毫无可圈可点之处(贝恩, 2019, p.323)，但事实上，这段时间安徒生在科学和哲学研究领域的深耕为其之后书写中的科学想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没有借助于对欧洲在19世纪得到的工业和科技发展、科学家集团与文艺圈子深度交往的理解，可能安徒生的精灵写作会单纯地被当作是一种对于东西文化传统的复刻。然而，始终对进步保持乐观是自然哲学家和诗人的共同点。这也使他们在对当时的发现和发明有着相同热情同时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未来的技术进步展示着高昂的信心。在写作中安徒生对他那个时代的伟大技术奇迹，如铁路、摄影和电报，以及他的科学家朋友奥斯特对于电磁学的发现进行了充满热情和毫无保留的描述(Ane Grum-Schwensen, 2005)。要理解安徒生精灵叙事中的“精灵”，则要寻找写作中使之由无生命之“物”幻化为具备知、情、意、行能力者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精灵的“精气”如何获得是至关重要的，而安徒生则在书写时为其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在他出版于1851年的作品《演木偶戏的人》中，一段看似不经意的对话表达了安徒生这样的创作思维。他通过一个木偶戏演员和一个被国家派到丹麦乡下开展科学教育的学生之间的交往，谈到了对于科学的认识。“比如说吧，有一片铁一溜出螺旋形的器具就有了磁性。这是什么道理呢？铁忽然获得了一种精气，但这种精气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想这和现实世界里的人差不多；上帝让人在实践的螺旋器具里乱撞，于是精气附在人身上，于是我们便有了一个拿破仑，一个路德，或者类似的人物”(安徒生, 2014, p.1043)。于是，在这种“精气”的附着下，木偶戏导演的木偶演员们获得了类同于人的思维和行为，构造了一个近乎于真实世界的社会。作家们通过艺术创作，将那些同时代人类想要做到而又无法突破技术和社会局限来达到的事情寄托于机器、寄托于人工智能，通过电和磁的技术想象，使其成为隐匿于万物，又遁于无形的精灵。这种书写不仅是社会发展在艺术领域的体现，也是对前代的智能叙事在文学领域中书写传统的继承与创造。

三、精灵书写及其对“人工智能”角色的预示

技术的发展体现了人类自身的需求，而技术领域中，人工智能的发展明显地体现出超越现实的特质。“美国人有广泛流传的科学幻想文学，它们热心地勾画着技术的乌托邦，它们喜欢构想出各种狂幻出奇的概念，诸如驾驭了时间，能够使人像旅客一样地漫游到各个过去时代的社会里去”(盖伦, 2003, pp.1-20)。安徒生在晚年所创造出的这些充满科学想象的作品有不少发表在美国的报纸上，深受美国读者欢迎。这种神奇的想象不仅能够使人漫游到过去的时代，也能够通过书写把人带到一个或近或远的未来。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体现了人类对于自身的总体性想象，而这些想象也与人类在生活中的需求相关。现在看来，在《一千年之内》(安徒生, 2014, pp.654-657)等作品中，安徒生成功地预测了飞机的发明和英吉利海峡下隧道的建造(Ane Grum-Schwensen, 2005)。那么，与电磁学等学科领域科学家有着深度交往的安徒生在其作品中对未来社会的人工智能有着预想性的涉及也未尝不可能。当代的科技发展事实已然证明，人工智能技术将深度介入人类生活，并逐步变更社会既有的情感、道德、法律规则。当这些角色不再仅是后台的代码，而是像安徒生笔下的精灵一

般，通过“具身互动”拥有了与环境及我们互动的具体身份时，传统的主仆关系便开始松动。正是这种基于具身的主动性，使得精灵所扮演的人工智能角色，得以突破其从属地位，进而勾画出未来更为复杂的人机关系发展趋势（李璇，2025, pp.115-117）。这也就成为今天我们在社会、法律、日常生活领域重新考虑规则和秩序的参考依据。

安徒生在1867年春天亲历了巴黎世界博览会。之后所创作的《树精》，不仅以拟人的手法用树精之眼展现了当时的科技发展盛况，还引发今天的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长久以来，在传统视野中作为客体存在的“物”，是否也可能发生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人工智能体在习得了人类给予的知识和思维模式后，其主动性和创造性如何体现（齐佳敏，2021）。作为对于这个关切的回应，安徒生在之后的作品中依托于精灵叙事，展开了对未来社会发展可能性的一种想象，并结合人类的欲求书写出对于人工智能可能承担的不同类型社会角色的预判。尽管安徒生反映科学倾向的作品不止一篇，但对于人工智能想象而言，我们借其在晚年发表的作品《开门的钥匙》来进行审读，可以发现文中的科学想象与今天人工智能技术已然达到的境况有些不谋而合。

《开门的钥匙》这个故事于1872年在哥本哈根发表。故事中的主人公“家臣”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获得了神奇的钥匙，从此他的人生开始扭转。——“他可以叫钥匙回答他的一切问题，甚至最秘密的事情”，“这家臣表现出他的聪明，让钥匙来回答一切问题”，“对于钥匙的知识，家臣不断地获得进步。钥匙成了他的娱乐和智慧的源泉”（安徒生，2014, pp.1541-1555）。在安徒生书写中，钥匙精灵至少承担了四重角色：

首先，钥匙精灵是主人获取知识和实践能力的仆从。在一次郊游中，因为晚归被关在城门外，家臣求助于钥匙精灵获得了开门的办法——把杂货商人的窗玻璃打破，叫醒店主。

第二，钥匙精灵辅助形成了决策参考。自从那次“砸碎玻璃”的交情后，杂货店主就和家臣熟络起来。一天夜里，杂货店主拜访家臣，希望其为自己的女儿指引一个前程。家臣于是又去问钥匙了。钥匙说：“胜利和幸运！”所以杂货店主的女儿洛特·伦的未来就这么确定了。

第三，钥匙精灵协助“侦破案件”。一天晚上，橱柜里的半块苹果饼不翼而飞，失踪的点心去哪儿了？谁也不愿承认。家臣问他的钥匙：“谁吃了那块苹果饼——猫儿呢，还是她（指女佣）的爱人？”钥匙回答说：“她的爱人！”女佣只得承认：这该死的钥匙什么都知道！

第四，钥匙精灵成为情感依托。家臣的妻子因偶感疾病而离世。在此后的一年中，钥匙精灵与家臣相伴，成为他唯一的慰藉。“他问它许多问题，它都一一作出回答”。“我会结婚吗？我会和谁结婚？”它说：“跟洛特·伦”。这与家臣的心意不谋而合，而有情人也在故事结尾终成眷属。

即便是在ChatGPT、DeepSeek已经石破天惊地诞生之后的今天，人工智能为人类所带来的体验也主要集中于辅助生产、知识获取、决策咨询、情感寄托等方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于“过去的艺术同现代的关系”的相关论述无疑为我们解释安徒生甚至更多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在自己的书写中涉猎于科技想象的现象提供了指引。“大家知道，希腊社会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力和社会形式本身”（马克思，2012,p.711）。这也就意味着，在当时的欧洲，正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人们对于科学技术进一步

发展的需求，这种需求反映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就成为对于想象性写作的基础。世界文学经典在漫长的跨文化传播中，也成就了其自身作为全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地位（都岚岚，2023, p.113-123）。安徒生写作中的这些关于人工智能的可能想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尚未获得实现的可能，但是即便是在其已逐步实现的现代生活中，仍然有存在的意义，因为这些作品不仅能够带给人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从某些方面而言，还是为人类社会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动力。

结语

在人类书写中，具有超能力的“精灵”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具有越来越强大的各项功能，且以更加迅速的姿态不断深度介入人类生活的“人工智能”是一个新话题。二者之间在某些方面存在的共通性，使得我们今天在人工智能社会还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时就要开始为这个新形态的社会构成讨论相应的规则提供可能。在明显具有科学转向的安徒生的精灵书写中，我们能够通过创新性的书写叙事，联想到人工智能已经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人类生活、还有可能在哪些方面影响人类社会。当然，一旦建立起安徒生的精灵书写与当今时代人工智能可能具有的功能和可能承担的社会角色的联系，我们就能够从更为深入的阅读中发现，他的精灵书写还触及到了——人工智能如何产生、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才能得到训练、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以及人类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信赖人工智能等——这些即便是在今天也富有前瞻性的问题，对于当下的人工智能研究无异于打开了新的视角，并提供了新的借鉴。

基金项目：2024 年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双语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研究”（项目编号：2024JGXM_063）。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Fu Wei ^{ID} <https://orcid.org/0000-0002-5476-6138>

Wang Ziyi ^{ID} <https://orcid.org/0009-0005-2061-6624>

References

- Grum-Schwensen, A. (2005). “Little Hans Christian and great Hans Christian: The poet and the scientist.”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Reviews* (04), 349-355.
- Bom, A. K., & de Muckadell, C. S. (2021). “National icons in education: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nd the cultural policy of the canon of Danish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04), 411-421.
- Johannsen, D. (2016). “On elves and freethinkers: Criticism of relig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literary fantastic in Nordic literature.” *Religion* (04), 591-610.
- Dymel-Trzebiatowska, H. (2015). “Dual or single address? Some reflections on Hans Christian Andersen's fairy tales in Polish translations.”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 埃尔塞·罗斯达尔（2022）：《维京人》，汪枫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Roesdahl, E. (2022). *The Vikings*, translated by Wang Fe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安徒生（2014）：《安徒生童话全集》，叶君健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Andersen, H. C. (2014). *The Complete Fairy Tales of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translated by Ye Junjia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安徒生（2020）：《安徒生自传：我的童话人生》，李道庸，薛蕾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Andersen, H. C. (2020). *The Fairy Tale of My Life: An Autobiography*, translated by Li Daoyong & Xue Lei. China International Radio Press.]

克尔凯郭尔（2023）：《克尔凯郭尔论安徒生——出自一个仍然活着的人的文稿》，京不特译。商务印书馆。

[Kierkegaard, S. (2023). *Kierkegaard on Andersen: From the Papers of One Still Living*, translated by Jing Bute. The Commercial Press.]

耶斯佩森, K. J. V. (2024)：《丹麦史》，李明, 张晓华译。商务印书馆。

[Jespersen, K. J. V. (2024). *A History of Denmark*, translated by Li Ming & Zhang Xiaohua. The Commercial Press.]

盖伦（2003）：《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何兆武，何冰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Gehlen, A. (2003). *Man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translated by He Zhaowu & He Bing. Shanghai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Education Press.]

吴国盛（2022）：《技术哲学经典文本》，清华大学出版社。

[Wu, G.S. (2022). *Classic Texts i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罗伯特·尼斯特·贝恩（2019）：《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一部传记》，赵晓因译。华文出版社。

[Bain, R. N. (2019).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 Biography*, translated by Zhao Xiaonan. Sino-Culture Press.]

柏灵（2018）：“科学选择与安徒生对丹麦民族浪漫主义的反思”，《外国文学研究》(02):97-107。

[Bo, L. (2018). “Scientific choice and Andersen’s reflection on Danish national roman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02): 97–107.]

程林（2023）：“1770年的‘人造智能’——从仿人智能事件到霍夫曼、比尔斯的早期机器人叙事”，《自然辩证法通讯》(05): 8-17。

[Chenglin (2023). “‘Made Intelligence’ of 1770: From Human-simulating Intelligence to Early Robot Narratives of Hoffmann and Bierce.”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05), 8-17.]

都岚岚（2023）：“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爱情?——论珍妮特·温特森《弗兰肯斯坦》中的跨界之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04): 113-123。

[Du, L. (2023). “New love in the age of AI? On cross-species love in Jeanette Winterson’s Frankissstein.”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04):113–123.]

江晖（2023）：“技术遐想与文明窥探: 20世纪初期日本报刊与文学中机器人形象的生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06): 114-125。

[Jiang, H. (2023). “Technological imagination and civilizational gaze: The emergence of robot images in early 20th-century Japanese media and literature.”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06):114–125.]

卡尔·马克思（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683-712。

[Marx, K. (2012).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2, pp. 683–712).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李璇（2025）：《化身博士》中的身体政治和人工智能隐喻，《文学写作与评价学刊》(01): 115-117。

[Li, X. (2025). “Body Politic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taphors in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01):115-117.]

齐佳敏 (2012): “机器人为何杀戮？——析《莫克森的主人》中的人工智能生命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02): 110-120。

[Qi, J. (2021). “Why do robots kill? The view of AI life in The Master of Moxen.”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02):110–120.]

宋晓梅 (2007): “略论北欧地区的神话”，《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03): 91-93。

[Song, X. M. (2007).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mythology of the Nordic region.”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03): 91–93.]

朱天飚 (2008): “丹麦后发展道路解析”，《欧洲研究》(04): 78-88。

[Zhu, T. B. (2008). “An analysis of Denmark’s post-development path.” *European Studies* (04): 78 – 88.